

蘇州文獻叢書第二輯

王衛平 主編

至德志

(外二種)

【清】吳鼎科 輯

吳恩培 點校



上海古籍出版社

013046739

蘇州文獻叢書第二輯

K295.33
05

王衛平 主編

至德志

(外二種)

【清】吳鼎科 輯

吳恩培 點校



北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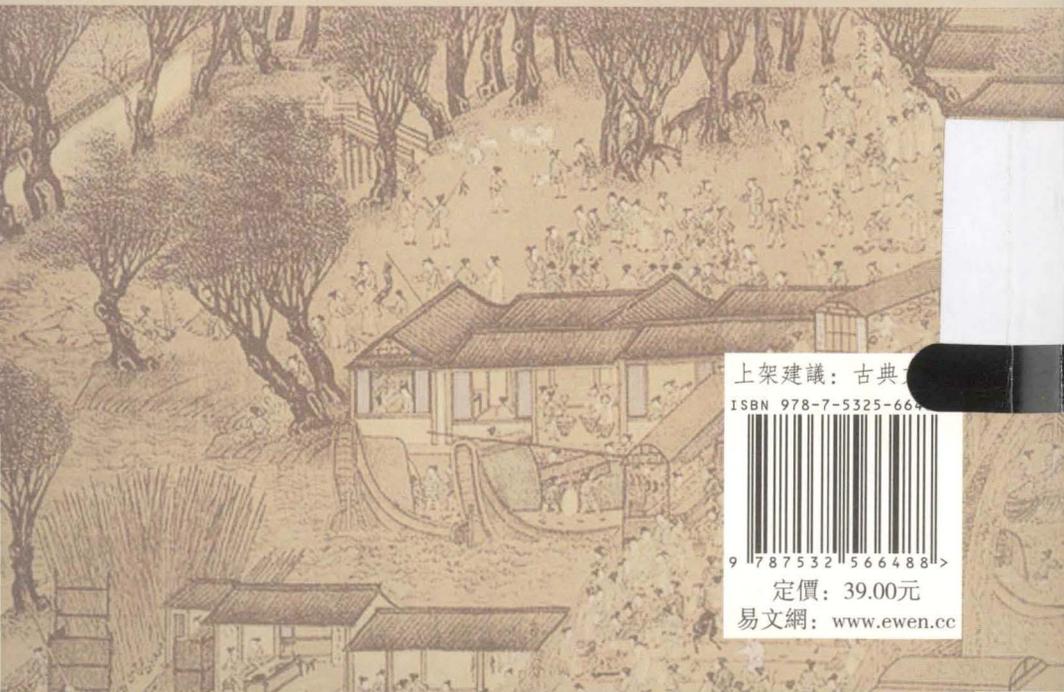
C1654558

上海古籍出版社

K295.33
05



世紀出版



上架建議：古典

ISBN 978-7-5325-6648-8



9 787532 566488 >

定價：39.00元

易文網：www.ewen.cc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至德志:外二種/(清)吳鼎科輯;吳恩培點校.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4

(蘇州文獻叢書第二輯)

ISBN 978-7-5325-6648-8

I. ①至… II. ①吳…②吳… III. ①泰伯—家族—史料②吳文化—研究 IV. ①K820.9②K295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2)第 221368 號

蘇州文獻叢書第二輯

至德志(外二種)

[清]吳鼎科 輯

吳恩培 點校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272號 郵政編碼200020)

(1)網址:www.guji.com.cn

(2)E-mail:guji@guji.com.cn

(3)易文網網址:www.ewen.cc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發行中心發行經銷

上海展強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開本 890×1240 1/32 印張 11.375 插頁 5 字數 292,000

2013年4月第1版 2013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數:1—1,800

ISBN 978-7-5325-6648-8

K·1643 定價:39.00元

如有質量問題,請與承印公司聯繫

《蘇州文獻叢書》編纂工作委員會

- 主任委員** 蔡麗新 王鴻聲
- 副主任委員** 繆學爲 陳 嶸
- 委 員** 徐春宏 朱曉平 金德政 張 欣 王衛平
袁勇志 馬衛中 羅時進 王稼句 吳恩培
朱小田
- 主 編** 王衛平

總序

王衛平 羅時進

吳之地域，自遠古形成，至今已有數千乃至萬年歷史。這一歷史的浩瀚川流，混茫遠接，涵演淵深，太湖文化於茲含孕；這片天賜的豐沃皋壤，盡望無際，滿目森茂，江南文明緣此成長；而憑陵高峻，俯瞰川原之古往今來，所映現的又不止是吳地之文化與文明，而是中華民族發展史，人類社會進步史的縮影。

初民遠逝，先賢杳渺。我們無法真正站在歷史的源頭，透過時代的時序去說明什麼，也無法站在其中任一驛站，撫摩當時的現場去顯示什麼。但憑借前人留給我們的豐富遺產，對吳地的歷史事件、過程、走向、結果都可以做某種程度的考證，做力所能及的還原，而視今探古，唯物以求，也能進行一定意義上的總結。吳文化，正是人們對吳地古往今來一切物質和精神現象的概括、提煉、呈現。她是吳地在漫長的歷史過程中的“人文化成”，即“文”作為一種存在意識和方式“化”入生產、生活、生命而形成的物質和精神的發展成果。

考察吳地“人文化成”的過程，當着眼於地、人、文三者的互動共生的關係。“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這在吳文化研究中是非常必要的。自然地理環境在吳地的歷史發展中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是人才與文化產生的土壤。正如陳去病云：“端委化俗文明開，延陵觀樂中原回。四科言氏尚文學，宗風肇起擎胚胎。加以

太湖三萬六千頃，澄泓渟蓄何雄恢。朝鍾夕毓孕靈秀，天然降茲迫屈攀宋之奇才。”^①穆彰阿亦謂：“蓋聞文章之事關乎其人之學之養，而其所由極盛而不可已者，則非盡其人之學之養爲之，而山川風氣爲之也。江南乃古名勝之區，其分野則上映乎斗牛，其疆域則旁接乎閩越，而又襟長江而帶大河，挺奇峰而出秀巘，故其靈異之氣往往鍾於人而發於文章。”^②正是清明靈秀的地理環境作用於人，方促進了“詩書之澤”、“文獻之邦”的形成，使得唐宋以來，尤其是明清時期，吳地出現了海內千百年從未產生，其他地域環境中也難以復現的人文盛景。這裏不妨看一看嘉靖年間陸師道在《袁永之文集序》中對明代吳中文苑巨匠騰躍景況的描述：

吳自季札、言游而降，代多文士。其在前古，南鏐東箭，地不絕產，家不乏珍，宗工巨人，蓋更僕不能悉數也。至於我朝受命，郡重扶馮，王化所先，英奇瑰傑之才，應運而出，尤特盛於天下。洪武初，高、楊四隼，領袖藝苑。永宣間，王、陳諸公，矩矱詞林。至於英孝之際，徐武功、吳文定、王文恪三公者出，任當鈞冶，主握文柄，天下操觚之士，向風景服，靡然而從之。時則有李太僕貞伯、沈處士啓南、祝通判希哲、楊儀制君謙、都少卿元敬、文待詔徵仲、唐解元伯虎、徐博士昌穀、蔡孔目九遠先後繼起，聲景比附，名實彰流，金玉相宣，黼黻並麗，吳下文獻於斯爲盛，彬彬乎不可尚已。正德、嘉靖以來，諸公稍稍凋謝，而後來之秀，則有黃貢士勉之、王太學履吉、陸給事浚明、皇甫僉事子安，皆刻意述作，力追先哲，而袁君永之，寔顛頤其間。^③

① 《陳去病詩文集》卷一《浩歌堂詩鈔》，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

② 潘世恩《潘氏科名草》，光緒三年吳縣潘氏燕翼堂刻本。

③ 《袁永之集》，明嘉靖二十六年姑蘇袁氏家刊本。

這是一份“文壇點將錄”，然而纔開到明嘉靖中期，已是繁不勝舉了，後來之英哲宗師復有多少？綜觀歷代，豈能盡數！這是值得吳中，即今天蘇州驕傲的成就。對於吳中這一人文盛況，我們應當從吳文化的層面上加以研究。

這一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吳文化具有歷史的屬性，也有現實的價值。廣袤的吳地，現代的發展與成就，與其過往悠悠的步履跡脈相連。今日萬物生命之根系，存在於歷史的土壤中；當下事物運動之動能，亦由歷史而累積。因此回望吳文化，不但可以建立一種文化自信，也能從傳統中為人們今天所從事的事業，尋求到借鑒與經驗。除此之外尚應看到，吳文化是地域文化，具有鮮明的地方性特點。這種地方性特點，正包含了豐富的地方經驗，它不但是方言音聲、風俗習慣、社會公序等形成的條件，也是在文化層面上與其他地域進行比較、映照的根據。從這一意義上說，研究吳文化，就不僅僅具有某種地方性意義了。它是對吳文化寶庫的建構，也是對民族文化寶庫的豐富。

吳文化研究，可以從不同路徑進行，而最基礎性的工作，當推文獻整理。1918年冬，吳江一批有識之士認識到地方文獻保護的重要，由柳亞子和薛鳳昌發起，成立了“吳江文獻保存會”（又稱“松陵文獻保存會”），其《吳江文獻保存會書目序》曰：

吾吳江地鍾具區之秀，大雅之才，前後相望，振藻揚芬，已非一日。下逮明清，人文尤富，周、袁、沈、葉、朱、徐、吳、潘，風雅相繼，著書滿家，紛紛乎蓋極一時之盛。且也一大家之出，同時必有多數知名之士追隨其間，相與賞奇析疑，更唱迭和；而隔世之後，其風流餘韻，又足使後來之彥聞風興起，沾其膏馥，而雅道於以弗替。用是詞人才子，名溢於縑囊，飛文染翰，卷盈乎緗帙，斯

故我鄉里之光也。^①

松陵一地之文獻尚且如此，蘇州一府文獻之富就更為洋洋可觀了。“文獻無徵，後生之責。夫責固有之，情更應爾。”因此，我們有必要對吳中文獻做有計劃的整理和研究，在現代學術理念指導下，建構與蘇州文化、經濟、社會發展相適應的文獻庫，作為儲存吳文獻、發展吳文化的平臺。

兩年前，經江蘇省哲學社會科學領導小組批准，我們蘇州大學建立了江蘇省吳文化研究基地。這是一個面向環太湖地區，面向江南，全面研究吳文化的科研機構。我們擬將吳文化之文獻作為研究重點之一，而蘇州是吳文化的核心地區，自然希望利用在地研究的條件，首先從蘇州文獻整理入手。蘇州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視地方文化建設，對地方文獻整理具有自覺的文化意識，非常支持這項工作，特別設立了專門項目，於是便有了這套蘇州文獻整理研究的系列。

文獻，是一個廣義的概念，古人以經史子集劃分四部，而每一部又有眾多類別。這些類別的著作在蘇州文獻中無不具備，由於各方面條件的限制，我們難以窺其全豹，畢功一役，故叢書擬擇其精華而選，逐步整理面世。而在選擇中尤其注意有代表性，且到目前為止尚未見整理的著作。古籍整理是一項學術性很强的工作，我們希望盡可能遵循學術規範，精益求精，但一定會不同程度地存在問題，尚望各方面人士給予批評指正，使我們的整理工作不斷走向完善。

（作者王衛平為江蘇省吳文化研究基地主任、羅時進為江蘇省吳文化研究基地首席專家）

^① 張明觀、黃振業編《柳亞子集外詩文輯存》，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89頁。

總序

王衛平 羅時進

吳之地域，自遠古形成，至今已有數千乃至萬年歷史。這一歷史的浩瀚川流，混茫遠接，涵演淵深，太湖文化於茲含孕；這片天賜的豐沃皋壤，盡望無際，滿目森茂，江南文明緣此成長；而憑陵高峻，俯瞰川原之古往今來，所映現的又不止是吳地之文化與文明，而是中華民族發展史，人類社會進步史的縮影。

初民遠逝，先賢杳渺。我們無法真正站在歷史的源頭，透過時代的時序去說明什麼，也無法站在其中任一驛站，撫摩當時的現場去顯示什麼。但憑借前人留給我們的豐富遺產，對吳地的歷史事件、過程、走向、結果都可以做某種程度的考證，做力所能及的還原，而視今探古，唯物以求，也能進行一定意義上的總結。吳文化，正是人們對吳地古往今來一切物質和精神現象的概括、提煉、呈現。她是吳地在漫長的歷史過程中的“人文化成”，即“文”作為一種存在意識和方式“化”入生產、生活、生命而形成的物質和精神的發展成果。

考察吳地“人文化成”的過程，當着眼於地、人、文三者的互動共生的關係。“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這在吳文化研究中是非常必要的。自然地理環境在吳地的歷史發展中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是人才與文化產生的土壤。正如陳去病云：“端委化俗文明開，延陵觀樂中原回。四科言氏尚文學，宗風肇起擎胚胎。加以

太湖三萬六千頃，澄泓渟蓄何雄恢。朝鍾夕毓孕靈秀，天然降茲追屈攀宋之奇才。”^①穆彰阿亦謂：“蓋聞文章之事關乎其人之學之養，而其所由極盛而不可已者，則非盡其人之學之養爲之，而山川風氣爲之也。江南乃古名勝之區，其分野則上映乎斗牛，其疆域則旁接乎閩越，而又襟長江而帶大河，挺奇峰而出秀巘，故其靈異之氣往往鍾於人而發於文章。”^②正是清明靈秀的地理環境作用於人，方促進了“詩書之澤”、“文獻之邦”的形成，使得唐宋以來，尤其是明清時期，吳地出現了海內千百年從未產生，其他地域環境中也難以復現的人文盛景。這裏不妨看一看嘉靖年間陸師道在《袁永之文集序》中對明代吳中文苑巨匠騰躍景況的描述：

吳自季札、言游而降，代多文士。其在前古，南鏐東箭，地不絕產，家不乏珍，宗工巨人，蓋更僕不能悉數也。至於我朝受命，郡重扶馮，王化所先，英奇瑰傑之才，應運而出，尤特盛於天下。洪武初，高、楊四雋，領袖藝苑。永宣間，王、陳諸公，矩矱詞林。至於英孝之際，徐武功、吳文定、王文恪三公者出，任當鈞冶，主握文柄，天下操觚之士，向風景服，靡然而從之。時則有李太僕貞伯、沈處士啓南、祝通判希哲、楊儀制君謙、都少卿元敬、文待詔徵仲、唐解元伯虎、徐博士昌穀、蔡孔目九遠先後繼起，聲景比附，名實彰流，金玉相宣，黼黻並麗，吳下文獻於斯爲盛，彬彬乎不可尚已。正德、嘉靖以來，諸公稍稍凋謝，而後來之秀，則有黃貢士勉之、王太學履吉、陸給事浚明、皇甫僉事子安，皆刻意述作，力追先哲，而袁君永之，寔顛頤其間。^③

① 《陳去病詩文集》卷一《浩歌堂詩鈔》，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

② 潘世恩《潘氏科名草》，光緒三年吳縣潘氏燕翼堂刻本。

③ 《袁永之集》，明嘉靖二十六年姑蘇袁氏家刊本。

這是一份“文壇點將錄”，然而纔開到明嘉靖中期，已是繁不勝舉了，後來之英哲宗師復有多少？綜觀歷代，豈能盡數！這是值得吳中，即今天蘇州驕傲的成就。對於吳中這一人文盛況，我們應當從吳文化的層面上加以研究。

這一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吳文化具有歷史的屬性，也有現實的價值。廣袤的吳地，現代的發展與成就，與其過往悠悠的步履跡脈相連。今日萬物生命之根系，存在於歷史的土壤中；當下事物運動之動能，亦由歷史而累積。因此回望吳文化，不但可以建立一種文化自信，也能從傳統中為人們今天所從事的事業，尋求到借鑒與經驗。除此之外尚應看到，吳文化是地域文化，具有鮮明的地方性特點。這種地方性特點，正包含了豐富的地方經驗，它不但是方言音聲、風俗習慣、社會公序等形成的條件，也是在文化層面上與其他地域進行比較、映照的根據。從這一意義上說，研究吳文化，就不僅僅具有某種地方性意義了。它是對吳文化寶庫的建構，也是對民族文化寶庫的豐富。

吳文化研究，可以從不同路徑進行，而最基礎性的工作，當推文獻整理。1918年冬，吳江一批有識之士認識到地方文獻保護的重要，由柳亞子和薛鳳昌發起，成立了“吳江文獻保存會”（又稱“松陵文獻保存會”），其《吳江文獻保存會書目序》曰：

吾吳江地鍾具區之秀，大雅之才，前後相望，振藻揚芬，已非一日。下逮明清，人文尤富，周、袁、沈、葉、朱、徐、吳、潘，風雅相繼，著書滿家，紛紛乎蓋極一時之盛。且也一大家之出，同時必有多數知名之士追隨其間，相與賞奇析疑，更唱迭和；而隔世之後，其風流餘韻，又足使後來之彥聞風興起，沾其膏馥，而雅道於以弗替。用是詞人才子，名溢於縑囊，飛文染翰，卷盈乎緗帙，斯

故我鄉里之光也。^①

松陵一地之文獻尚且如此，蘇州一府文獻之富就更為洋洋可觀了。“文獻無徵，後生之責。夫責固有之，情更應爾。”因此，我們有必要對吳中文獻做有計劃的整理和研究，在現代學術理念指導下，建構與蘇州文化、經濟、社會發展相適應的文獻庫，作為儲存吳文獻、發展吳文化的平臺。

兩年前，經江蘇省哲學社會科學領導小組批准，我們蘇州大學建立了江蘇省吳文化研究基地。這是一個面向環太湖地區，面向江南，全面研究吳文化的科研機構。我們擬將吳文化之文獻作為研究重點之一，而蘇州是吳文化的核心地區，自然希望利用在地研究的條件，首先從蘇州文獻整理入手。蘇州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視地方文化建設，對地方文獻整理具有自覺的文化意識，非常支持這項工作，特別設立了專門項目，於是便有了這套蘇州文獻整理研究的系列。

文獻，是一個廣義的概念，古人以經史子集劃分四部，而每一部又有眾多類別。這些類別的著作在蘇州文獻中無不具備，由於各方面條件的限制，我們難以窺其全豹，畢功一役，故叢書擬擇其精華而選，逐步整理面世。而在選擇中尤其注意有代表性，且到目前為止尚未見整理的著作。古籍整理是一項學術性很强的工作，我們希望盡可能遵循學術規範，精益求精，但一定會不同程度地存在問題，尚望各方面人士給予批評指正，使我們的整理工作不斷走向完善。

（作者王衛平為江蘇省吳文化研究基地主任、羅時進為江蘇省吳文化研究基地首席專家）

^① 張明觀、黃振業編《柳亞子集外詩文輯存》，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89頁。

前 言

《至德志》外二種》，含《至德志》、《蘇亭小志》、《韓忠武王祠墓志》三種蘇州地方文獻。分別輯錄了古代吳地歷史上三位重要名人泰伯、蘇軾和韓世忠的相關記載。其中不乏珍貴的史料，可補史志之不足；亦有衆多傳記、詩文的輯錄，可為相關文獻研究提供參考，具有較重要的版本價值；而以人物為中心收集三人相關記載及後人重建祠墓或追思之作乃三書共同之特色，既可見歷代士人對三位名賢之尊崇，更便於學者研究，故哀為一編，以期嘉惠學林。

茲就三書具體情況縷述如下：

一、《至德志》

志者，記也。“至德”，指道德的最高境界，語出《論語·泰伯篇》中對泰伯的贊譽：“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泰伯，《史記》作“太伯”。商末，泰伯與其弟仲雍自陝西岐山的周族部落南奔至長江下游的太湖流域，建勾吳國，成為江南文明最早的開發者。《史記·周本紀》、《史記·吳太伯世家》及其後的《越絕書》、《吳越春秋》等文獻對泰伯事蹟均有記載。

關於泰伯南奔，史學界多有爭論。其中既有對泰伯南奔持疑之說，亦有對泰伯所奔之不同地望的爭論。李學勤先生在《勾吳史集序》中指出：“關於吳國歷史的疑謎，最關鍵的莫過於太伯、仲雍建立

吳國一事。”^①

地方文獻具有存史、資治、教化的作用。《至德志》一書，為蘇州泰伯廟專志。泰伯廟，又名至德廟，為江南地區最早奉祀勾吳國始祖泰伯之祠廟。關於其始建年代和位置，《至德志》卷一“泰伯廟”條載：“漢桓帝永興二年(154)詔建泰伯廟于吳郡閶門外鴈宕村。”《至德志》卷三“至德廟圖志”條記載更詳：“桓帝永興二年(154)敕建，在吳郡閶門外吳縣西三里鴈蕩村之南。”這些記載在蘇州諸多方志中均未見之。故《至德志》一書存史及補缺的文獻價值，由此可見一斑。此外，該書還記載了古代蘇州泰伯廟春秋祭祀時的祭期、祭品、祭器等禮儀內容、記載了贊頌泰伯的詩詞文賦等文學作品、關於泰伯為一世祖的《吳氏世系圖》，以及傳說中孔子存世的惟一書法作品——題延陵吳季子墓十字碑文等，內容涉及禮儀、文學、譜牒、書法等多種學科，在補史之缺的同時，也起到了詳史之略、續史之無的作用。

治天下者以史為鑒，治郡國者以志為鑒。對中國古代的地方官吏來說，《至德志》等志書是他們施政的必備之書。古代蘇州地方官員在施政中“以志為鑒”的實例甚多。如《吳郡志》所附《修廟記》記載的蘇州泰伯廟軼事說，南宋高宗建炎年間，在戰火中蘇州泰伯廟“鞠為灰燼”，“厥後草創，殆無以揭虔妥靈”。於是“邦人合詞而進曰：廟貌不治之日久，大懼神或怨恫。”是時，地方官員修復泰伯廟，“乃致昭告，乃鳩良工”。而是年，“風霽雨休，禾則大熟”。

《至德志》一書的內容，反映了泰伯對吳地古代百姓的教化作用，就是孔子對泰伯的“至德”評價。泰伯在為吳地百姓樹立道德楷模的同時，亦為改變江南早期的蠻夷民風，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綜上可見，本書具有如下特點：其一為地方性特點，表現在其既有特定的空間範圍，又同時有鮮明的地方色彩。其二為資料性特點，

^① 引自吳文化研究促進會編《勾吳史集》，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年。

即該書既是一部記載泰伯這一歷史人物的資料書，又是一部可供查考的工具書。

《至德志》全書十卷首一卷，吳鼎科編，彭啟豐序。

吳鼎科，字庭寶，生卒年不詳，為吳氏一百四世，《至德志·宗支繁衍志》有記載。其餘各卷校訂者亦均為吳氏後裔。

作序者彭啟豐(?—1783)，字翰文，號芝庭，又號香山老人，長洲(今蘇州)人，雍正五年狀元。歷官修撰，入直南書房；乾隆間吏部、兵部侍郎，左都御史、兵部尚書，晚年主講紫陽書院，有《芝庭先生集》。

《至德志》版本流傳絕少，筆者目前僅見蘇州圖書館藏光緒丙子(1876)冬月重刊本，故謹以之為底本標點。

二、《蘇亭小志》

《蘇亭小志》，清李彥章撰，該書封面作“蘇亭小志”，然書內各卷又分別作“蘇祠小志卷一”、“蘇祠小志卷二”等，故《蘇亭小志》又名《蘇祠小志》。

蘇祠，即蘇文忠公祠，祠址在蘇州城東定慧寺嘯軒，因宋人蘇軾而傳。

蘇軾(1037—1101)，字子瞻，號東坡居士，世稱蘇東坡，眉州眉山(今四川省眉山縣)人。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進士。神宗熙寧間通判杭州，歷知密州(治所在今山東省諸城縣)、徐州(治所在今江蘇省徐州市)、湖州(治所在今浙江省吳興縣)等地。御史劾以作詩訕謗朝廷，貶謫黃州(治所在今湖北省黃岡縣)團練副使。哲宗元祐間，累遷翰林學士，出知杭州、潁州(治所在今安徽省阜陽市)。紹聖初，又以為文譏斥先朝的罪名，遠謫惠州(治所在今廣東省惠陽縣)、儋州(治所在今海南省儋州市)。卒謚文忠。蘇軾在散文、詩、詞等領域均有傑出成就。其散文與歐陽修並稱“歐蘇”，名列“唐宋八大家”之一。詩與黃庭堅並稱“蘇黃”，開有宋一代詩歌的新氣象。詞與辛棄疾並

稱“蘇辛”，一掃當時綺豔柔靡的風尚，為豪放詞派的創始人。其在政治上主張慎重，反對王安石的新法，故屢遭貶斥。

《蘇亭小志》記敘了蘇東坡所書陶淵明《歸去來辭》與蘇州的淵源故事。內容上，它由幾個不同時間節點發生的故事聯綴而成：

(一) 北宋故事——《蘇亭小志》卷一錄《東坡紀年錄》載：“紹聖三年(1096)丙子，六十一歲，公(蘇軾)在惠州。”是時，蘇州定慧院禪人卓契順千山萬水而來，時已六十一歲的東坡老人十分感動，“問其所求”，卓契順答曰：“惟無所求。”東坡“固問不已”，他才委婉提出求“數字乎”，即求一墨寶，於是“公為書淵明《歸去來辭》以遺之”。此事亦經蘇軾《定慧院書歸去來辭跋》(載《蘇亭小志》卷二)一文記錄，僧人義舉得以千載留名。^①

(二) 明代故事——距上述北宋故事三百四十多年後的明正統五年(1440)，任朝廷工部右侍郎的周忱巡撫江南諸府，因定慧寺藏蘇軾墨本故物，而與之結緣。《蘇亭小志》卷二錄周忱在《刻歸去來辭跋》中說：“蘇文忠公兩官杭州，復守湖州，往來姑蘇，未嘗不至定慧，故寺中題詠獨多。”接着，周忱回想起蘇東坡曾書淵明《歸去來辭》條幅的舊事：“紹聖二年，公在惠州時，書與寺之僧卓契順。予嘗見刻本於彭澤，心甚愛之。”然“至定慧，周覽廊廡，徘徊泉石間，追想文忠公舊遊之所，嘉契順之為人，常終日不忍去。獨惜此篇刻於彭澤，而不刻於此。每歎息以為闕典，暇日以語寺之住持，欣然告予曰：‘寺中舊藏墨本故在。’亟命取而觀之，見其楮墨陳故而行列□□，與彭澤刻本不相類，不敢必其為文忠公所書。然字體清奇，別有一種道邁之□。文忠公之真蹟乎？因命買石刻之，以備寺中之故事云”。《蘇亭小志》卷二另錄黃省曾《定慧寺嘯軒碑記》則記為“工部侍郎文襄周公巡撫

^① 《定慧院書歸去來辭跋》所記時間為“紹聖二年”，與上《東坡紀年錄》的“紹聖三年”有別。